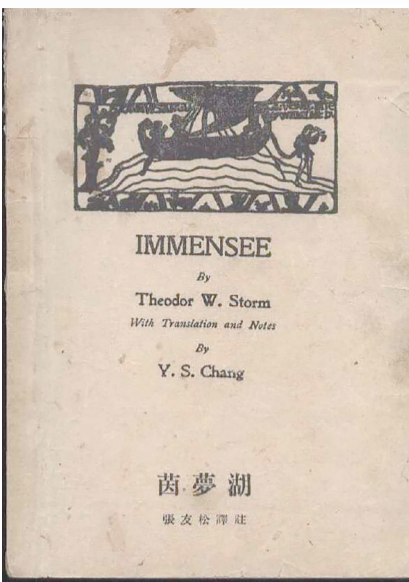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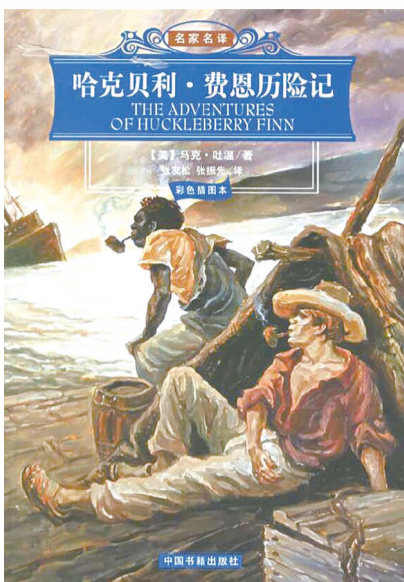


编者按

近读《新文学史料》系列,论鲁迅与林语堂失和事,多名学人的回忆文章均指向同一个名字,张友松。

张友松,1903年生于醴陵西乡三石塘,系革命烈士张挹兰胞弟,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期间即与郁达夫、邹韬奋、冯雪峰、柔石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交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更是114次提到这位小他22岁的年轻人……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包括编者在内的不少株洲人都对这位频繁出现在各种新文学史料中的人物很是陌生;所幸的是,在张友松辞世之前,报人徐伏钢通过各种途径探访到已经垂暮之年的张友松,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访谈资料,并在若干年后落笔成文。本刊摘编如下,重温这位醴陵走出的翻译大家的传奇人生。



张友松在各个时期出版的部分译著书封面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风物

隐真岩探古

萧兰桂

隐真岩离我家不远,三十年前,我在乡中学教书,去过那儿。高广数丈的山洞,嵌入峭壁半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确实让人叹服。然而岩壁上苍劲古朴的“隐真岩”石刻,被宅上残留的“宝相寺”门额,更让我好奇。偏僻的山洞为何取名隐真?宝相寺建于何年?毁于何时?此后经年,翻阅县志,见艺文中有不少关于隐真岩和宝相寺的诗文,才知道这里自古就是方家文人看重的宝地。其荒芜寂寥的外表下,深藏着岁月的风云,儒释的兴衰,人世的悲欢,不由得生发再次拜访的念头。

今年疫情期间,我宅居于乡,一日接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电话,嘱我写篇有关隐真岩的文字,于是我再次探访了这正在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湘东儒释文化圣地。

隐真岩位于攸县新市镇钟村佳桥村寺门前,所在山叫寿龙山。是山起于江西武功,经酒埠江茶籽山,盘旋到此。传说南齐东昏侯时,因不满时政黑暗,挂冠东归,率全家来政修道的司空张巴玉爱上了这里,白天上山采药,晚上修炼洞中。张司空后来在阳升观得道升天,这里自然就附丽了神圣的色彩。

唐宋时期,崇尚释道,司空修道之处赐建道观。信士香客不远千里,朝圣升阳观,访仙隐真岩。从现有的有关隐真岩的诗文中,最早的可找到南宋胡仲弓的《隐真岩字翁景辅韵》,其诗如下:

山林营小憩,此隐未为真。造粟浑闲事,因金却误人。洞迷归去路,羽化本来身。后此岩居者,犹言寂寞滨。

从诗题看,此诗是作者游隐真岩时步翁景辅诗韵而作。翁景辅不知何人,猜想或是其同伴,或是先其游览,写过隐真岩的诗歌。从胡仲弓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隐真岩的怀疑,对道家炼丹的否定。除此,现存有关隐真岩的其它诗文,则大多表现了对宝地的迷恋、隐逸的向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攸县明代进士文士昂的七律《隐真岩》。诗云:

峭壁层岩宿白云,登临尽可出尘氛。花迷幽壑藤萝古,洞接晴岚石磴分。山径迂回苔藓没,溪风层叠浪成纹。何时仙侣黄粱熟,岩上同餐坐夕曛。

诗歌不仅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隐真岩桃花源般优美静谧的自然风光,更是直接抒发了诗人对仙侣闲逸生活的向往。

这块堪比桃源的风水宝地,元代时又被释家看中,建有宝相寺。开址的圆明禅师,又名千岩元长,系浙江萧山县许贤乡人,俗姓董,年十七随叔父往寺庙读经,19岁受戒,习律于杭州灵芝寺。后因在灵隐寺担任书记,得以在浙江行省平章政事那木台斋建上,见到著名的中峰明本禅师,得受“狗子无佛性”之话头而为其弟子。熟悉元代文坛掌故的人,莫不知道中峰禅师和元代攸县人、元曲大师、朝廷侍制冯子振私交甚厚,他俩唱和《梅花百咏》的故事为一时美谈。

释悟联大师在给我们描绘这幅蓝图的时候,虽然语气平静,但眼睛里仍闪着兴奋的光。我想,无论是谁,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兴复曾经香火旺盛的古代名刹,都是一件功德无量值得高兴的大事,更何况释门中人。

衷心祝愿释悟联大师的宏愿早日实现。



嵌入峭壁半腰间的隐真岩

株洲面孔

翻译大家张友松,被遗忘的传奇人生

帮鲁迅打官司,跟林语堂闹矛盾,译著等身却鲜为人知



青年张友松



晚年张友松

1994年的元宵节。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狭窄和杂乱的居室里,墙角边的小床上蜷缩着一位白发稀疏的老人。

微弱的光线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发黄的被盖和老人瞎了一只眼睛的苍白的脸上。靠墙一侧的床边放了一只小闹钟,床头上一盏积满灰尘的小台灯。我一阵心悸。难道眼前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我苦苦寻觅的皇皇10卷本《马克·吐温选集》中文译者、被人誉为“开启世界文化之窗”的著名文学翻译家张友松吗?

走进这间小屋之前,我手里拿着从老报人车福先生那里得到的地址,在住宅大院里四处打听这位当年鲁迅的朋友、第一位把马克·吐温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大家,许多人却摇头不知。直到我向一名年轻人仔细描述了很久之后,他才将信将疑地说:“你说的该不是住在我家对门的张老头吧?”

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张老头”的房门,并很快确认,眼前这位白发老者,正是我要寻找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张友松!

让我们先把时光倒回6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吧。

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恶与他有关

1929年8月28日。上海。一场大雨之后,云收雨驻。晚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带着鲁迅的书样纸版和所欠稿费,送去靠近虹口花园的北四川路尽头景云里鲁迅先生的家。自此,一场北新书局同鲁迅之间的“版税风波”终于得以和解。

当晚,李小峰在北四川路南云楼宴请鲁迅、许广平和郁达夫、王映霞等人。林语堂随后也携夫人一起赶来赴宴。

酒酣面热之后,李小峰提起这场风波其实是受了书局前同事、青年作家张友松的挑拨。鲁迅先是没有表态。林语堂则随即附和了几句,还顺势责备了当时并不在场的张友松。

饭桌上的人都没有想到,鲁迅这时突然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脸色发青,大声吼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鲁迅申辩说,他同北新书局打官司,根本没有受任何人挑拨,林语堂这是明显在讥讽他。林语堂当时也壮着喝了几杯酒,不甘示弱,站起来同鲁迅针锋相对,并大声申辩说,他完全没有讥讽先生的意思。

据后来林语堂回忆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李小峰欠了鲁迅很多账,也不知道两人还为此打了官司。他说那天同鲁迅闹翻,完全是鲁迅“神经过敏”。他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

鲁迅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辩,鄙相悉现。”

当时郁达夫眼看双方“火药味十足”,赶紧站出来打圆场,一面按住鲁迅坐下来,一面拉了林语堂和林太太,随即离开了酒楼。自此,鲁迅和林语堂这对多年的文坛宿友终于分道扬镳,从此断绝了两人间的所有往来。对于这一段文坛史实,鲁迅、林语堂和郁达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详细记载。

徐伏钢

鲁迅借钱给他筹办书局

1903年11月12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12岁那年,他随大姐挹兰迁居北京,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半工半读,课余翻译英文小说。

当年张挹兰在北京大学读书,跟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一起闹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北京共产党部妇女部长,后来与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一同被捕,并于同一天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架下。

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大姐一道南来新加坡,转道去当时荷属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后来,张友松同大姐挹兰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并供

养家中的母亲和弟妹。大姐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一下变得 heavier,也不能继续留在北大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同情,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便亲自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

张友松原本与李小峰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同学,两人都曾是鲁迅和林语堂名下的学生。后来李小峰在上海创办北新书局,鲁迅的很多书都是通过他出版的。

谁知,北新书局做了不到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迅稿费而同李小峰彻底闹翻。“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打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回忆说。

为此,他一人帮鲁迅找律师同李小峰打官司,向对方

为译书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

张友松从北新书局出来创办自己的春潮书局时,林语堂曾答应为他翻译苏联作家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张友松说,当时林语堂还没有动笔,就已先付了他一笔版税。可是后来林语堂译了一半就扔下不

管了,催过多次之后,他才叫张友松接着把后半部译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同林语堂联合署名翻译《新俄学生日记》的由来。

据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在林语堂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

中,唯有这部《新俄学生日记》是他与人联合署名的译著。该书由他亲自写序,由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出版。

张友松为这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几十年后提起这桩公案,心里依然忿忿不满。

《鲁迅日记》114处提到张友松

查阅《鲁迅日记》,发现日记中114处提到张友松。其中,仅1929年便有89处,主要记载张友松帮他打官司的事情,也包括当时文坛故友的一些往来。

日记记载,周海婴出生刚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当时的福民医院看望许广平和海婴,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仙果牌烟卷四合”。可见,张友松当年同鲁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鲁迅那时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版税。北新书局一再拖欠版税,让鲁迅的生活受到很大

影响。海婴出生前一月,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友松、家斌来,晚托其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1929年8月13日)家斌姓董,是张友松在北新书局的旧同事,杨律师全名叫杨铿。

鲁迅还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有“夜大风雨,屋漏不能睡”字样。可见,尽管当时鲁迅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生活的窘迫却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日记还记载,张友松结婚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亲自“买铝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张

大家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1951年9月,张友松到北京参加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译、采访和组稿工作。1954年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专业翻译。反右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是遭受打击。张友松最后终于从文坛上消失,被人彻底遗忘,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94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91岁的老人了。

老人是在1984年和老伴一起迁居成都的,住在女儿家。老伴姓徐,年老体衰,自理生活尚且困难。夫妻俩曾有一个儿子,不幸早已病故,一切饮食起居只能靠女儿一家照料,而偏偏女儿做工的那家工厂又年年亏损,每月的基本工资都没有保障。

我的到访吵醒了老人清凉

的梦。当时他已经视力不好,听力也衰退了许多,行动起来非常困难。

老先生得悉我去采访他,要为他拍照,便在我的帮助下从床上欠起身来,摸索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穿好衣服。他倾身向前,只见两只手颤抖着拉开床前的书桌抽屉,摸出一只假眼眼嵌在右眼眶,然后又颤巍巍地自书桌的玻璃杯中掏出一圈塑料假牙套进嘴里。

我为老人的悲惨境遇深感不平。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一个人经受一点苦难可以使自己更坚强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他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翻译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密西西比河上》《镀金时

代》《傻瓜威尔逊》和《赤道环游记》等马克·吐温的全部小说。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集《短外桃源》、美国黑人作家基伦斯的《扬布拉德一家》、史蒂文森的《荒岛探宝记》,还与人合译了《马克·吐温传奇》一书。10卷本中文版《马克·吐温选集》后来也在台湾出版发行,受到海内外读者热烈欢迎。

1995年,张友松病逝于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陋室,时年92岁的白发独眼老人,不得不搁置手中的放大镜与译笔,结束长达六十多年的翻译生涯。

“没有人为您发论文,没有举行像样的告别仪式,没有人为您树碑立传。”张友松在《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里如是写道。